

# “小飞乐”：新中国第一股

1984年发行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小飞乐”股票,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20余年间,股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中国第一股究竟是怎样勇敢地横空出世的呢?这与“小飞乐”的创始人秦其斌有着密切关联,他是早年推动中国股市破冰之旅的重要人物之一。

秦其斌,1940年出生,1958年考入复旦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在上海无线电九厂技术科。

20世纪80年代初,各单位开始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培养干部。这样,年轻好学、思想活跃的秦其斌被抽调到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下属的元件工业公司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1982年,上海无线电一厂搞企业改革,秦其斌被派去蹲点,落实经济责任制。他在实践中首次对产权界定有了概念,并积累了管理经验。蹲点结束后,秦其斌提出想到基层做点实际工作。

1983年初,秦其斌被任命为上海飞乐电声总厂第一副厂长,1984年接任退休的老厂长成了电声总厂厂长。这时的秦其斌年富力强,雄心勃勃,有知识懂技术又有管理经验。他不甘于仅仅为仪表系统的产品做配套,而开始带领电声总厂开拓经营。当时,“音乐茶座”十分红火,他就大胆设想,提出本厂生产的扬声器除了给电视机做配套,还可以做成音响。于是,就有了电声总厂下设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即“小飞乐”)的创新,有了以后“小飞乐”发行股票的故事。

企业要发展,资金是关键。既然提出要设立新的企业,就得有资金。但这笔资金却是首要而棘手的问题。

在这之前,秦其斌曾经参加过上海市长宁区工商联的一次集会,也结识了一些老工商业主,有了对股份制知识储备,老工商业者集资入股办企业的事启发了秦其斌。情急之下,爱琢磨的秦其斌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即:一方面企业拿出一元钱,另一方面再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一元钱。这样,既解决资金问题,又能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可谓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然而,毕竟是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年代,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无形阻力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民币的诞生,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1947年12月2日,正在艰苦转战中的毛泽东,坐在陕北一家农民窑洞的土炕上,收到一封中央工委董必武拍来的电报。电报说:“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邓商议建立银行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工委已同意……”

毛泽东阅后,递给坐在桌子对面的周恩来。

周恩来看过后说道:“南汉宸意见,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他还说,我们不能像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样,各带各的钞票。”

毛泽东听了笑道:“情形还真有点像八国联军进北京,我们晋察冀用的是边币,晋冀鲁豫用的是冀南币,山东用的是北海币,东北用的是东北币,西北用的是农民币,一旦打进天津、北平去,可不就是七八种货币一起上市嘛!不过,现在就在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不是为时还过早了一些?”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见回了电报。

董必武收到中央回电后,马上把南汉宸找来,吩咐说:“现在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早了一点,但我们准备工作松

懈不得,工委已经研究,从明天起,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你就牵头做筹备处主任。”

南汉宸说:“现在要做的准备工作,一是搜集所有的统一货币发行政策,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筹备起足够的发行准备金。还要确定出几种票面,各种票面的金额与价值含量,还要设计出票版图案,选定好纸张等等……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统一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那我们的货币就叫‘人民币’了。”

董必武叫了点点头说,“这个名字很好!它已说明了我们的银行、我们货币的性质。既是人民的,那就不是某个地区、部门的,而必定是全国性的,全国人民的嘛!”

南汉宸非常佩服董必武的这番解释,精辟透彻,于是说:“到时候,钞票上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还得请你来写。”

1947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就挂在平山县离西柏坡一里许的夹峪村一家农民小院子里。

董必武思考了一阵说:“那么,票面上改成什么图案为好呢?”南汉宸问:董必武思考了一阵说:

1948年秋,筹备处迁至石家庄,正赶上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筹备处同志在弹片飞啸中去抢救赶印的人民币和其他备用物资,南汉宸带头在火海中搬运抢救,没有一个人顾及到个人的安危。

为了筹划人民币的发行,董必武亲自骑马到位于阜平县南峪村的晋冀边区印刷局里去视察。他在印刷局(即边区印钞厂)里一连住了几天。董必武从南峪村晋冀边区印刷局回来之后不久,有一天把南汉宸找去,对他说:“你们设计的人民币票版样中央工委同志都看过了,前几天我又打电报给毛主席,告诉他票版正面印的是毛主席像。今天主席回来电报,不同意在票版上印他的像。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汉宸,你把票版拿回去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下!”

“那么,票面上改成什么图案为好呢?”南汉宸问:董必武思考了一阵说:

1948年秋,筹备处迁至石家庄,正赶上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筹备处同志在弹片飞啸中去抢救赶印的人民币和其他备用物资,南汉宸带头在火海中搬运抢救,没有一个人顾及到个人的安危。

为了筹划人民币的发行,董必武亲自骑马到位于阜平县南峪村的晋冀边区印刷局里去视察。他在印刷局(即边区印钞厂)里一连住了几天。董必武从南峪村晋冀边区印刷局回来之后不久,有一天把南汉宸找去,对他说:“你们设计的人民币票版样中央工委同志都看过了,前几天我又打电报给毛主席,告诉他票版正面印的是毛主席像。今天主席回来电报,不同意在票版上印他的像。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汉宸,你把票版拿回去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下!”

“那么,票面上改成什么图案为好呢?”南汉宸问:董必武思考了一阵说:

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人们亲切地昵称其为“小飞乐”。

发行股票的那天,许许多多的热心人早早来排队购买股票,排队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

后来,当秦其斌回忆起那段创立“小飞乐”的人生经历时总会不无感慨地说:“没有他们的捧场,股票一生下来就会是‘弃儿’。他们才是真英雄,真金白银支持股份制改革!”

就这样,“小飞乐”承担起了新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零的突破。而创造奇迹的秦其斌,回想以往一步步走过的历程,说:“那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发行承销商,也没有明确详细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这么摸着石头过河。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无形的手在推进,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这么成了。”秦其斌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他参与这件破天荒的“中国第一股”的心态,用“水到渠成”来说明股份制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大势所趋。

“小飞乐”召开成立大会之前,必须走一道必不可少的关键程序——去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孰料,却又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工商局工作人员用疑惑的口气道:“你们是什么所有制的?”

秦其斌回答说:“我们是股份制的。”

工商局工作人员说:“股份制?所有制中没有股份制!”

当时工商部门登记的表格上只有三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

秦其斌想,我们肯定不是国营的,也不是私营的,那就登记“集体”的吧。最后,他拿起笔来选择了“集体”这一隶属关系,解决了这一尴尬难题。但他没想到,“集体”这一性质为后来第一次的分红带来了困扰。

秦其斌虽然荣当“小飞乐”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却是“零股东”。在当时的环境下,有的领导还特意嘱咐他:“你是党员干部,你不能买股票,家属也不能买!”

后来经过讨论,上级部门最终批准秦其斌购买一股股票。

对此,后来回忆时,秦其斌笑着调侃说:“我当时要是买了‘小飞乐’的原始股,早就是

‘杨百万’了!”

让谁也没想到的是,集体所有制后来引发了“小飞乐”第一次分红是否为私分国有财产的争论。

1986年初,“小飞乐”进行第一次分红。经股东大会一致同意,每股分红35元,而后,股东自己出15元,配售一股,分红和扩股结合起来操作。那次分红方案是复旦大学金融系毕业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的张宁科长主设计的。她认为,召开股东大会标志着股份制的机制正式运行。

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刚刚完成了分红扩股,却又得开始应对税务局稽查大队的查账审核。税务局稽查大队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

秦其斌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国营的。”

“集体的也是国家的!”稽查大队认为这些是不能私分到个人的。

于是,秦其斌只好写检讨罚款。

但无论如何,秦其斌还是让小飞乐按照股份制的形态运作起来了。其历史性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率领的美国证券代表团。

其时,凡尔霖还给邓小平带来了两件特殊的礼物——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和一枚可以自由通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

股票,市场经济的象征。这在中国是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长期弃之不用的。因而,邓小平能否接受这两件礼物,凡尔霖心中忐忑不安。

然而,凡尔霖过虑了。

邓小平不仅高兴地收下了他的礼品,而且还将一张面额为50元人民币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只股票回赠给凡尔霖。这张“小飞乐”股票成为第一张被外国人拥有的股票。凡尔霖先生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第一位外国股东。

这一举动在当时及至后来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性美谈。

其实,这是有其必然的前因的。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美国百科全书

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著名华裔教授林达光。宾主之间进行了耐人寻味的一段谈话。

林达光向邓小平说:“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小平深思熟虑地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邓小平的这个谈话,实际上已经披露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要选择的新的目标模式的端倪。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为实践中的中国经济改革活动开辟了一块全新的天地。

因此,几年后邓小平赠送股票的举动,就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了。这一非凡举动,即刻引起了国内外新闻舆论的极

大兴趣。《朝日新闻》发表整版评论,声称中国企业行将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国经济终将走向市场化。

其实,邓小平赠送的不过是一张面值50元人民币的股票,然而,对于凡尔霖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于是,他当即改变行程,直奔上海西康路101号,找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黄贵显,亲自办理了股票转让手续。

黄贵显,中国金融界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他和凡尔霖,同为太平洋两岸的证券大王。不同的是,凡尔霖腰缠万贯,富甲欧美;黄贵显却两袖清风,全家人挤在一个简陋的亭子间里。黄贵显后来每每提起当时的情形一直记忆犹新:“我搞了一辈子金融工作。改革开放后,怎样才能搞活金融,全国都在探索。股票、证券,几十年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中国能不能搞,开始我们心中也没底,但一直想试一试。幸好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很支持我们的想法,拍板支持我们试一试,这样,才办起了证券公司。飞乐股票发行后,效果很好,但议论很多,我们也经常提心吊胆。小平同志将我们的股票赠送给凡尔霖,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大家都吃了一颗定心丸,非常激动。凡尔霖也很重视,亲自跑到上海来,找我给他办理了这张股票的正式转让手续。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邓小平倡导与设计,他一直鼓励我们的想法,拍板支持我们试一试,有了他的支持,改革才能不断地深入发展起来,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最终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

股份制后,邓小平南巡讲话,让股份制改革的浪潮席卷神州。如今,中国大地上,上市公司层出不穷,买股票分享上市公司成长的成果成为普通市民的重要理财方式。

(姚远 来源:世纪风采)



小飞乐股票

# 北平解放前夕 人民币诞生

懈不得,工委已经研究,从明天起,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你就牵头做筹备处主任。”

南汉宸说:“现在要做的准备工作,一是搜集所有的统一货币发行政策,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筹备起足够的发行准备金。还要确定出几种票面,各种票面的金额与价值含量,还要设计出票版图案,选定好纸张等等……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统一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那我们的货币就叫‘人民币’了。”

董必武叫了点点头说,“这个名字很好!它已说明了我们的银行、我们货币的性质。既是人民的,那就不是某个地区、部门的,而必定是全国性的,全国人民的嘛!”

南汉宸非常佩服董必武的这番解释,精辟透彻,于是说:“到时候,钞票上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还得请你来写。”

1947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就挂在平山县离西柏坡一里许的夹峪村一家农民小院子里。

1948年秋,筹备处迁至石家庄,正赶上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筹备处同志在弹片飞啸中去抢救赶印的人民币和其他备用物资,南汉宸带头在火海中搬运抢救,没有一个人顾及到个人的安危。

为了筹划人民币的发行,董必武亲自骑马到位于阜平县南峪村的晋冀边区印刷局里去视察。他在印刷局(即边区印钞厂)里一连住了几天。

董必武从南峪村晋冀边区印刷局回来之后不久,有一天把南汉宸找去,对他说:“你们设计的人民币票版样中央工委同志都看过了,前几天我又打电报给毛主席,告诉他票版正面印的是毛主席像。今天主席回来电报,不同意在票版上印他的像。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汉宸,你把票版拿回去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下!”

“那么,票面上改成什么图案为好呢?”南汉宸问:董必武思考了一阵说:

“人民币,是人民自己的货币,应当以反映解放区人民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人民币是新中国的货币。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在票版的正面和背面,除必要的阿拉伯数字外,一律用中文,不能像某些货币那样,掺杂着英文字!”

南汉宸回去,告诉了设计师王益久、沈乃镛,根据董老的意见对钞票重新进行设计,并将董老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和钱数的一些字也一并带了过去。

两位设计师很快就设计出拾元、贰拾元、伍拾元三种票版来,所有的图案都是工人农民搞生产的图案。拾元的正面:左侧是农民车水,右侧是矿井场区;贰拾元的正面:左侧是农民牵驴驮货,右侧是火车在铁道上行驶;伍拾元的正面:左侧是毛驴井边车水,右侧是煤矿的煤车。以至于后来发行的壹佰元、贰佰元、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的票面,也都沿用这种工农生产结构的。

1953年发行第二套人民

币时,负责设计工作的是著名画家罗工柳。开始时,他们参照苏联货币都印有列宁头像的做法,设计出的各种票版也都是毛主席的像。毛泽东审定时,又否决了。第二次送审时,周恩来还是提出了部分修改意见。原来,伍元券主景民族团结中,有人高举毛主席画像,周恩来指示说:毛主席的意见不要把他的像画上,这里还有画像,应当改为标语牌。壹元券主景画面天安门上,原来有红旗、彩灯和毛主席像,周总理也指示将画像取下。

1948年11月,四野解放东北全境之后百万大军全部开进关内,对天津等地实行了围而不打、隔而不周的战略包围,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速。面对这一形势,周恩来打电话给南汉宸,让他赶紧动员一切力量发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否则就要采取别的措施。

根据周恩来这一指示,董老于11月18日主持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中心议题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

会上,董老再一次慎重地向南汉宸道:“汉宸,时不我待呀!你们的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

“我看可以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各项工作都已经就绪了,十二种面额的票版,已经请中央几位领导审定过了,如果明天挂出人民银行的牌子,明天就可以将钞票发行出去。为了准备北平解放后立即由我们人民币占领市场,我们城工部的同志已经派人携带印版进北平,同那里的一家印刷厂谈妥,已秘密地印出一批钞票。等解放军一进城,人民币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了。”南汉宸充满信心地说。

董老当下拍板做了决定:“好,这样我们就定下来了,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贴出布告,宣告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

就在这一天,第一批伍拾元票面的人民币,在河北省平山县银行正式对外发行;接着,又在石家庄发行贰拾元、拾元票面的人民币。

人民币诞生后,很快成为解放区的通用货币。

(杨青 来源:党建导刊)